



刘 厚 明

耍 蛇 少 年

花 城 出 版 社

耍蛇少年

刘厚明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西吉安地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125印张 2插页 190,000字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,700册

书号10261·595 定价1.70元

自序

收进这个集子里的，是我近两、三年的一部分新作。

回顾这些作品的形成，我感到一个人的性情、志趣，乃至美学观念，往往根植于他童年生活的沃土中。

也许我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里长大的，因而特别倾心于大自然。小时，我常和小伙伴跑到郊野去，捉蟋蟀，捕蜻蜓，跳到小河里游泳；空气清新，满眼绿色，野花和蒿草把风儿都染香了，到处是活泼泼的生命。这使我心旷神怡，留连忘返。这种依恋大自然的潜意识，在我长大后仍保存在心底。现在，年已半百了，北京动物园和植物园，还是我最喜欢的去处。在国内或国外旅行，最能引起我兴趣的，是海南岛、大兴安岭和那些富有“野趣”的非洲国家。大自然以及她怀抱中的动的或静的生命，时常触动我的创作灵感，诱发我的艺术想象力。在这个集子的作品里，就出现了龟、蛇、狗、猕猴、河马、大象……不过，我写动物还是意在写人，歌唱善良和爱。

在另一些作品中，我着力刻画了教师的形象，这是因为我在一九五三——一九六〇年，当过七年教师。我喜爱这种人对人、灵魂与灵魂交流的工作，我想写出教师工作的诗

意、人情味和创造性。比如，《黑箭和它的朋友》里的“三只猴”邢玉柱，就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；那条狗（黑箭）的情节，也有事实根据。邢玉柱和他饲养的那条“校犬”，给我添了不少麻烦，却也给了我许多人生的、教育工作的启迪，把这些麻烦和启迪体现在作品里，对我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。因此，写教师的作品，确实是从我心中涌出的诗。

此外，《小勒布尔和歌手哈尔桑》、《耍蛇少年》、《彩子的风筝》以及《两个耳光》等篇，其中人物和故事的原型，也是我在海外访问时目睹或耳闻的。我爱孩子，无论他们是中国孩子，还是外国孩子。我写外国孩子，是想在他们和我的小读者之间，搭起一座桥，使双方互相见面，交流心曲。

我努力想写出成人也乐于欣赏的儿童文学作品。这就需要找到一种语调，使孩子们喜欢，成人读起来也不致腻烦——这很难，我为此花费了很多力气。

我期待着小读者和大读者的批评。

1984年6月19日于北京西单

目 录

阿诚的龟	七二
圣餐·涅槃·永生	五五
鹿皮夹克	四五
徐三下老师	三七
我和打高江	二六
我说出了「仙姑」的秘密	一九
好大的西北风	一
自序	一

黑箭和它的朋友

二〇九

小勒布尔和歌手哈尔桑

一六〇

大象的忿怒

一五五

啊，我亲爱的大河马

一四九

两个耳光

一四〇

耍蛇少年

一三三

彩子的风筝

一二三

凌霞

一一四

最终目标

九五

好大的西北风

人们都说“女长十八，男长二十”，可于荣长到六岁，就怎么也不长个儿了！

他七岁上学，在一年级的小豆儿里就是最矮的。五年以后升到六年级，他居然一丁点没见长！坐在位子上两脚够不着地，书桌盖顶着下巴颏。如果说我们班的四十多个同学，仿佛一片不断往上蹿的小树林，那么，于荣就象这小树林里的一个木桩子。他也真象个木桩子！个子不长，可脑袋大了，脖子粗了，胸脯变得宽厚了，体重把他两条短腿压成了罗圈儿。一句话，他成了个怪模怪样的畸形儿，又丑又滑稽的矮墩子。

“你们知道吗？”有一次，教音乐的郑老师对我们说，

“于荣就是所谓的侏儒，他永远也长不高了。他很不幸……你们要爱护他，尊重他，因为欺侮一个生理上有缺陷的人，是很不道德的。”

郑老师娴静、端庄，有一双细长好看的眼睛；一年四季总是罩着一件蓝布旗袍，却总能保持干净平整。她对我们说了上面的话，便把长长的、乌亮的辫子往身后一撩，坐到风琴那里去，领我们唱起了《好大的西北风》：

好大的西北风啊，
吹得树林沙沙响……

她唱得很悲凉，就象把你带进了风声呜咽、落叶飘零的树林；唱着唱着，她的眼睛也湿润了……

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理解郑老师的话，但她的歌声，她的感情，却打动了我们的心。从此，我们都很爱护和尊重于荣，不允许外班同学欺负他、笑话他。我和班长卢宝山每天上学、放学时，还和他就伴儿，当他的“保镖”。

就因为保护于荣、一致对外的缘故吧，同学之间也都变得亲密起来。一种对弱者的同情和庄重的义务感，沟通了四十多颗少年人的心。全班只有一个同学例外，就是瘦猴儿申俊生。

我们这所小学叫“红卍字会小学”，是个佛教会办的。校舍座落在西直门内大街，两层灰砖小楼，在三十年代中期也算堂皇了。这“慈善”学校不收学杂费，还管一顿早饭：

凡学生便可优先到马路对面的普济寺去打粥——全校二百多同学，人人挟着个饭碗，排成四路纵队，浩浩荡荡向那座古庙进发。队伍一到，庙门外黑压压挤成一片的穷人和乞丐，便闪开一条路；我们穿过那群面黄肌瘦、破衣烂衫的人们，直抵高架在庙门口那口硕大的铁锅前，依次把碗举过头顶，让蹬在板凳上的大汉舀上一勺子杂米稠粥。然后，又迎着穷人和乞丐们羡慕的、或嫉恨的目光，各自端着那碗霉味儿的粥，浩浩荡荡返回学校。不一会儿，教室里就响起一片“忒儿喽——忒儿喽——”的喝粥声……申俊生从不参加打粥，他吃豆沙包，或者烙饼卷鸡蛋；他所以进了这所学校，和我们这些穷孩子为伍，全因为他爸爸是红卍字会的一个副会长。

申俊生吃得虽好，却不长肉，精瘦精瘦，象根竹杆，和矮墩儿于荣恰成对比。这个副会长的儿子经常仗势欺人，于荣自然成了他欺侮取笑的对象。

“癞蛤蟆！”申俊生向来这样称呼于荣，“让小爷爷骑着你跑一圈儿！”

他一跳，骑在了于荣脖子上。

“我不让你骑！就不！”于荣拼命扭动，想把瘦猴儿甩下来。

申俊生用两条细腿紧紧攀住他的粗脖子，拍着他的大脑袋说：“你敢不答应，我就叫我爸爸开除你！”

于荣瞪着大而突出的眼睛，满脸涨红，气哼哼地吭哧两声，只好迈开罗圈腿，驮着申俊生颠颠地跑起来。他爸爸是

个补鞋匠，因痨病三天两头卧床不起，妈妈成天背个破筐，走街串巷换“洋取灯儿”，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。于荣最怕被这“慈善”学校开除。他想念书，他要喝那碗霉味儿的杂米粥。

“快来看呀！看瘦猴儿骑癞蛤蟆呀！”于荣驮着申俊生围着操场跑，一群低年级的毛孩子跟在后边又笑又嚷。申俊生得意洋洋，顺手从树上折下一根干枝，抽打于荣的屁股蛋：“驾！驾！”……

我在教室隔窗看见了这一幕，喊了一声：“瘦猴儿又欺负于荣呢！”围在炉旁烤火的同学们，立刻一窝蜂地涌出教室。班长卢宝山一马当先，上去揪住申俊生的衣领子，把他从于荣背上拽下来，喝道：“你小子又缺德呢！”

卢宝山性子刚直，壮得象牛犊，申俊生被他拽了个趔趄，却不敢还手，只跳着脚骂：“你管得着吗？臭拉车的儿子！”

“你欺负于荣，我这拉车的儿子，就要管管你这念佛的儿子！”卢宝山拍拍隆起的胸脯。

“小爷爷服你管？呸！”申俊生也拍了一下鸡胸脯，呸了他一脸唾沫星子。

“你是谁的小爷爷？”卢宝山火了，抓住他的手腕往后一拧，另一只手按他的肩膀，按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“哎哟，哎哟……放开我！放开我！”申俊生疼得直叫唤。

“别放他！别放他！”大伙儿义愤填膺地说，“问问

他，往后还敢不敢欺负于荣！”

“说！”卢宝山又按了他一下。

“哎哟哟！”申俊生的鼻尖已经杵在地上，只得讨饶，“不敢了！不敢了！行了吧？”

可是，当卢宝山松开手，他便哭哭咧咧地朝校长室走去：“臭拉车的儿子，你等着吧！小爷爷跟你没完！”

为这件事，卢宝山受到了校长的惩罚；而于荣竟也无端地受到一场残忍的凌辱。

这天下午，在操场上召开了全校大会。大家首先扯着嗓子唱《校歌》：“太乙玄妙灵，大道之始圆，包罗万象外，充满宇宙间；卍字小学立，广进女儿男，升学成旧生，前途有大千……”这些似通不通、佛经似的歌词，我们一句也不懂，但都知道只要一唱校歌，学校就要有大事宣布了。

果然，秃头校长缓步登上体操台，一边捻着手里的红亮亮的念珠串，一边慢吞吞地、道貌岸然地宣布：六年级学生卢宝山，无故打骂申俊生，触犯了佛法校规，给予记大过一次的处分，并撤销他的班长职务！

我们正暗自为卢宝山愤愤不平，秃头校长忽然又命令于荣站到前面去，指着他说：“你们看看这个丑八怪吧！他前世造了孽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就叫他今世托生了侏儒！你们只管打他，骂他，骑他，笑话他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正是让他赎罪呢！”

于荣面对全校师生，垂着大脑袋，全身索索发抖……

放学后，我和于荣、卢宝山一道回家，路上谁也不说

话。走到于荣家门口，他忽然站住问道：“你们说，天上真有菩萨吗？”我摇摇头，表示说不准。卢宝山说：“别听秃驴瞎咧咧，反正世界上没有歪心眼的菩萨！”

第二天有音乐课。郑老师眼里迸跳着异样的火花，说：“同学们，下星期要举行全校歌咏比赛。你们班就唱《好大的西北风》吧。由于荣同学领唱！”

最后这句话，使我们都吃了一惊：于荣的确有一副好嗓子，唱起歌儿来象笛声一样清亮圆润；可是他那副样子，往台上一站……

“嘻嘻！”申俊生耸耸肩膀笑了，“叫癞蛤蟆领唱，谁愿意陪着他去丢人现眼？！”

郑老师看也不看那瘦猴儿，只说：“谁不同意于荣领唱，可以不参加这次比赛！”

“郑老师，我不行啊……”于荣却站起来，怯怯地说，“您别叫我领唱，我……我不行！”

郑老师走到他跟前，深情地注视着他：“于荣，你行！你一定唱得很好！每个人都有他的缺陷，也有他的长处；你的音质音色谁也比不上，这就是你的长处。”

卢宝山高声喊道：“我赞成于荣领唱！”同学们跟着纷纷响应：“我也赞成！我也赞成！”……

歌咏比赛在佛堂里举行了。

佛堂也是礼堂，有四、五个教室那么大，肃穆幽沉。只有隆重的全校性活动，才能在这儿举行。象小舞台一般的佛坛上，供着观音菩萨的画像。上悬横幅写着“慈航普渡”四

个楷体大字。下设乌木香案，中间是一盏长明灯，琥珀色的灯油上漂着一朵小火苗；两旁四个景泰蓝香炉里燃着檀香，幽幽的香味飘散到每个角落。这佛坛当时在我心目中，仿佛是神圣得有点可怕的另一个世界。

我至今还记得那次歌咏比赛的情景——全校师生端坐台下，肃静得大气也不出。秃头校长陪着校董们坐在第一排的来宾席上。他们手里各自捻着一串红亮的念珠，都那么慈眉善目，含着尊贵者特有的那种微笑，观赏一班又一班的演唱。一支歌子唱完，校董老爷们便把念珠溜到腕子上拍拍手，秃头校长谦卑地跟着拍拍手，老师和同学们再鼓一阵子掌。

轮到我们班了。我们列队走上佛坛，整齐地站在香案前。瘦猴申俊生站在第四排，他到底还是参加了，并且使劲儿伸长细脖子，好吸引他那副会长爸爸的注意。郑老师用鼓励的目光扫视我们一遍，稳重地坐到风琴后面去，点头招呼领唱者上台。

他上台了！迈着重罗圈腿走到队前站定，尽力挺直那畸形的、又矮又蠢笨的身子。长明灯的光影，在他那大而突出的眼里晃动；檀香的轻烟，在他那颗大脑袋周围缭绕。台下一阵波动，一阵骚乱，有个孩子失声叫道：“嘿，癞蛤蟆！”几声窃笑，象一阵阴冷的风，掠过整个佛堂。校董们震惊地瞪着台上的“怪物”，又一起朝校长怒目而视。校长如坐针毡，秃顶亮而且红了，他终于腾地站了起来——恰在此刻，风琴响了！洪亮的琴声响彻佛堂，带着嗡嗡的共鸣。郑老师用力踏着踏板，踏板吱吱作响。校长只好又尴尬地坐下去，

掏出手帕揩秃顶上的汗珠。

于荣——我们的领唱者，我们善良的、丑陋的兄弟，随着琴声放开了歌喉：

好大的西北风啊，
吹得树林沙沙响。

我们齐声接唱：

它和树林跳舞啊，
一二三四呼呼呼！

在大风“呼呼呼”的呼啸里，于荣的声音冲出来，高亢而悲凉：

它对树林大声叫，
现在天气太冷了！

我们和他一起唱：

我们都盼春天来，
一二三四呼呼呼……

掌声骤起，犹如春雷炸裂了绵密的乌云。我惊喜地去看郑老师——她竟伏在风琴上哭了……

这之后不久，我们就毕业了，告别了那座灰砖小楼，告别了有欢乐也有苦恼的小学时代。

那年秋天，于荣的爸爸终因痼病死去，妈妈带着他和一堆破烂家什，从我们那一带搬走了。他们为什么搬家？搬到

哪儿去了？谁也不知道。母子俩是在一个秋风瑟瑟的黎明悄然离去的。

就这样，于荣从老同学们当中默默消逝了。只是在瘦猴申俊生摔折了腿的那天，我们才又说起他来。

申家独门独院。院里有一棵大枣树，通红的枣儿闪露在亮绿的叶隙间，炫耀着饱满的姿容。申俊生常爬上去摘枣吃。他骑在树杈巴上一边嘎巴嘎巴地吃，一边用枣核抛打墙外路过的孩子。有一回，他抛枣核用力过猛，竟从树上直跌下来，把左腿摔折了！我知道了这个消息，立刻跑去找卢宝山，象报喜似地告诉了他。卢宝山晃着拳头解气地说：“活该！活该！谁叫他从前净欺负于荣呢！这才真叫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！”我说：“他管于荣叫癞蛤蟆，往后呀，咱们叫他瘸腿猴儿！”

于荣搬走了，申俊生已无法再拿“癞蛤蟆”取笑他；可“瘸腿猴儿”这个绰号，却象影子似地时时跟着申俊生。只要他架着木拐，一瘸一瘸地从家里走出来，胡同里的孩子们便围上，拍着巴掌叫嚷：“瘸腿猴儿，瘸腿猴儿，一步一瘸晃悠悠儿！”他举起木拐打他们，他们便象喜鹊似地飞散开，又逗气地喳喳：“你追我呀没门儿，谁叫你是瘸腿猴儿！”……

我们为于荣憋的那口气，终于吐出来了！从此也就再不提他；似乎申俊生得到了报应，世界上就不会再有人欺侮他，我们也无须惦记那可怜的侏儒了。

然而，有个人却始终惦记着他。

那是第二年盛暑的一个傍晚，我坐在胡同口摇着蒲扇乘凉，一群毛孩子跑来跑去捉迷藏玩。申俊生架着拐，拿着个带木轴的纸卷，一瘸一瘸走来；走到一棵老槐树下，有个孩子突然从树后冲出，一头撞在他胸口上。把他撞了个仰八叉，木拐甩到一边，那个带木轴的纸卷在地上一滚展开了，原来是一幅观音菩萨的画像！孩子们又拍手雀跃地喊：“瘸腿猴儿，败了家，穷得没法卖菩萨……”

怎么说申俊生家败了呢？早在一年以前，他那个当红卅字会副会长的爸爸，跑到天津寻了个姘头，立了外家；从此就撇下一大家子人，再也不回来了。申家老老小小十来口，只好把那座四合院的北房和东房租出去，靠吃房租度日。物价飞涨，入不敷出，小辈人里排行老大的申俊生，便跑起当铺来，把家里值几个钱的东西，一件件送进那高高的柜台；等到连他家佛龕前的铜香炉和铜蜡扦也陆续进了当铺，就轮到菩萨本身了。大概当铺不收菩萨像，申俊生只得带回来——现在，他被撞倒，菩萨帮不了他的忙，反倒成了孩子们取笑他的把柄。

他似乎摔得很重，躺在地上扭动、呻吟，想爬却爬不起来，孩子们围着他跳呀，嚷呀，好不快活。我也拍着蒲扇给他们打拍子，幸灾乐祸地凑热闹。正闹得欢势，一个过路人上去搀起申俊生，给他掸掸土，又替他拣起了木拐和菩萨像。孩子们一哄而散，我却象被弹簧弹起来，飞快地跑过去朝那人鞠个大躬：“郑老师！”

“是你！”她好象一时想不起我的名字了，但一双细长

好看的眼里放出了光彩。

在那次歌咏比赛之后，郑老师因为让于荣领唱《好大的西北风》，被秃头校长解聘了。后来听说她去教家馆，每天奔走于东城的两、三户阔人之家。一年多不见，她变了许多：长辫子剪掉了，齐肩乌发里竟有了几根银丝；蓝布旗袍洗得泛了白，肘部打上了补丁，却仍是那么干净平整。不知怎的，我心里一酸，说了一句挺笨的话：“郑老师，您不是才刚三十来岁吗？怎么长了白头发？”她淡淡一笑没回答我，把木拐和菩萨像递给了申俊生，问道：“没摔坏吧？”申俊生摇摇头，急急走了。我忿忿地说：“哼，他连个谢也没给您道，真没人性！”

“他也许害羞了。”郑老师望着那瘦长的、蹒跚的背影，感叹地说，“我从前对你们说过，欺侮一个生理上有缺陷的人，是很不道德的，也许他现在懂得了这个道理……”又忽然问我：“于荣住在哪儿？我是特意来看他的。”

我怔了一下，说：“他家早就搬走了！搬到哪儿去了，谁也说不清。”

郑老师默默地站了好一会儿，失望地叹了口气，然后说：“往后，不要欺负申俊生。他，不是也挺令人同情吗？”又问了问我的情况，便走了。

吃过晚饭，我就躺在了床上，心里沉甸甸的。我不理解郑老师为什么同情申俊生，那个从不知同情别人的人！但是，使我更为不安的，是她至今还惦记着于荣，我竟早已忘了那善良而又可怜的老同学……